

浙江村庄转型研究丛书



改革与乡村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义乌市七一村村庄政治研究

Gaige yu Xiangcun

郎友兴 周松强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村庄转型研究丛书



改革与乡村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义乌市七一村村庄政治研究

Gaige yu Xiangcun

郎友元 周榕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与乡村: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义乌市七一村村庄政治研究 / 郎友兴, 周松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9

(浙江村庄转型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6004 - 6

I. ①改… II. ①郎…②周… III. ①农村 - 群众自治 - 研究 - 义乌市
IV. ①D6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635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大乔
责任校对 季静
责任印制 何艳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6.5
插页 2
字数 246 千字
定价 6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改革与市场中的实践：村庄政治变迁之逻辑 及其动力	(2)
第二节 分析框架与研究思路	(5)
第三节 个案的选择与研究方法、资料来源	(8)
一 七一村：典型的村庄、典型的书记和典型的事例	(8)
二 主要研究方法	(9)
三 资料与数据	(10)
第四节 本书的内容安排	(11)
第一章 村落的背景	(13)
第一节 村落区域背景与地理位置	(13)
第二节 村落的区域经济背景	(16)
一 “兴商建市”战略造就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 市场	(17)
二 三产协同发展，现代服务业正成为义乌新的经济 增长点	(18)
三 贸工联动，加快建设国际性小商品创造中心，产业 集群趋势明显	(19)
第三节 村落的区域文化背景	(19)
第四节 村政的沿革	(21)
第五节 社会经济生活	(28)
第二章 人口与阶层	(35)
第一节 人口状况	(35)

第二节 何氏宗族	(40)
第三节 村庄的职业和阶层	(42)
第四节 外来人口	(59)
第三章 村庄的中共组织：村庄权力的核心	(66)
第一节 政党下乡：七一村党组织的发展历程	(67)
一 前人民公社时期：政党进村	(67)
二 人民公社时期：政党权力核心地位的树立与巩固	(69)
三 村民自治与政党传统权威地位	(71)
第二节 村党支部书记：村落权威资源的成长	(75)
一 权威建构的道德基础	(78)
二 权威建构的社会事件过程	(83)
三 权威建构的绩效基础	(88)
四 权威的体制性赋予	(94)
五 “富人”治村模式下村庄权威的正当性	(104)
第三节 结语	(109)
第四章 村民自治与村庄精英政治的再造	(111)
第一节 从“地方自治”到“乡村自治”再到“村民自治”	(111)
第二节 七一村“村民自治”历程	(116)
第三节 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代表结构的精英化	(121)
一 村庄精英与村委会成员的结构	(121)
二 村民代表会议：村庄精英的聚集地	(129)
第四节 村民自治与村庄治理精英的再造	(132)
第五节 分工而不分家：七一村两委关系之形态	(136)
一 村两委关系的几种类型	(138)
二 和谐两委关系的建构：分工而不分家	(140)
三 村两委和谐关系状态下的村庄治理绩效	(142)
第六节 结语	(145)
第五章 社区组织与村庄治理	(147)
第一节 从村落到行政村再到农村社区	(147)

一 治理的转型：从行政村到农村社区	(147)
二 浙江省农村社区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152)
三 义乌农村新社区建设	(155)
第二节 七一村社区服务中心：社区组织与制度规范	(165)
一 社区组织构架	(165)
二 规章、制度的建设	(167)
三 社区事务运行的制度化	(179)
第三节 社区服务中心的功能与村庄治理的绩效	(182)
一 七一村社区组织之功能	(182)
二 治理绩效举隅：荣誉与村庄的治理	(188)
三 幸福指数与村庄治理绩效	(189)
第四节 结语	(199)
第六章 公共空间的成长与村庄权力的运作	(200)
第一节 乡村公共空间的“复兴”	(200)
第二节 七一村村庄公共空间的演进与生长	(204)
一 何姓祠堂和七一村宗族关系	(204)
二 传统公共空间的萎缩	(206)
三 新型公共空间的生长	(210)
第三节 公共空间的功能及其与村庄权力的互动	(216)
一 功能	(216)
二 公共空间与村庄权力的良性互动	(224)
第四节 结语	(226)
第七章 结语：改革与村政的演进	(227)
第一节 主要的发现和结论	(227)
一 村庄权力结构的变与不变	(227)
二 发展型权威的 formation 与确立	(230)
三 权力网络与权力的制度化运作	(233)
四 能人政治：村庄政治的精英化与乡村政治未来的 图景	(234)
第二节 从个案到类型	(236)

附录	(240)
附录 1 2005 年市级示范村申报表	(240)
附录 2 2005 年市级示范村考核指标现状表	(241)
附录 3 七一村村务公开制度	(243)
附录 4 问卷	(246)
参考文献	(250)
后记	(258)

绪 论

本书的研究个案是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道七一村。像中国其他许许多多的村庄一样，进入改革开放年代的七一村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巨大的宏观变迁之中。通过这个个案，要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所实施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村庄政治尤其是村庄权力结构及运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笔者试图通过这个个案的研究，表现出一个更大区域的社会特征，因为“我们面对的任何区域个案都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的‘个体’存在物。虽然制度演进的梯度各地不同，甚至所呈现出的具体问题也有明显的区域特质，但由此揭示的制度本质和问题的实质却具有共通性、共趋性特质”^①。

不过，这里首先需要对“村庄”和“政治”这两个概念作些说明。“村庄”有两类，一是自然村意义上的村庄，二是行政村意义上的村庄，本书所讲的村庄政治中的村庄是指行政村意义上的村庄。行政村是一个现代的概念，是近代以来力图将乡村社会现代化的一种努力，是指政府为了便于管理而确定的乡下边一级的管理机构所管辖的区域。自然村和行政村两者的关系是自然村一般小于行政村，也就是说，几个相邻的小村可以构成一个大的行政村。这个行政村由一套领导班子（支部、村委会）管理，但可以把几个自然村分成几个村民小组，每组一个组长，这些自然村都要受行政村村委会和村支部的管理和领导。自然村是由村民经过长时间聚居而自然形成的村落，它受地理条件和生活方式等的影响。比如在山里头，可能几户在路边居住几代后就会形成一个小村落，这就叫自然村。“政治”是一个广泛的

^① 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概念，这里主要指与权力相关的一个概念。本书并不讨论村庄政治的方方面面，重点在于村庄权力的基础、主体及其运行。

第一节 改革与市场中的实践：村庄 政治变迁之逻辑及其动力

在中国乡村研究中，村庄政治的研究早已成为重点研究内容之一，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以村庄公共权力结构及其变迁作为透视村庄政治现象的一个切入点，因为村庄政治是理解乡村政治性质的重要领域，而对村庄公共权力结构的分析则是理解村庄社会政治的基础。

研究中国村庄的权力结构与运作，需要讨论下列 5 个重要的问题：（1）农村社区的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Who）？（2）这些权力是如何获得的（How）？（3）各权力组织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Role）？（4）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Relationship）？（5）权力运行的机制与结果是什么（Mechanism and Result）？对于以上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治的演化与运行逻辑。

那么，逻辑背后的动力是什么？笔者以为，“改革”与“市场”是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治社会变化的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政治、社会结构、产业与经济、道德伦理和信仰都受到“改革”与“市场”的巨大冲击，并被重新构建，由此所产生的变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最为深刻的变迁（前两次是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周雪光教授在 2000 年发表的题为《中国城镇中的经济转型与收入不平等：来自追踪数据的发现》一文中也有类似的思路。在这篇文章中，他试图把政治和市场二者结合起来解释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认为在中国，国家改革和市场推进是经济转型的两个主要动力源泉，这两个动力促使政治和市场在互动中共变。^① 毛丹教授在《村庄的大转型》一文中也分别从“村庄与市场”、“村庄与

^① Zhou Xueguang, 2000,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转载于《社会分层与流动阅读文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内部资料。

国家”和“村庄与大社会”三个维度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村庄的转型：“一方面越来越被卷入市场经济乃至市场社会的建构过程，另一方面被日益纳入现代国家全面梳理社会的过程。这意味着国家与农村、市场与农村、城市社会与农村这三组基本关系的重新整理安排。这是中国农村社会从未经历的巨大转变。”^① 改革与市场两种力量贯穿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村级政治制度变迁的进程。

村庄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与整个社会的转型相关联。本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国家在村庄政治权力结构转型与变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及其政策一直是推动村庄政治与权力关系变化的主要动力。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及由此所带来的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与政治制度的转变，1978 年源于农村的经济制度的改革及由此所带来的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重构，是中国农村 60 年来政治变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今天，我们如果离开了这两个进程，就很难理解与想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村庄政治是如何演变与运作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的权力结构性变动，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农村的制度性改革的推动。改革是统治者对既定制度所进行的调整，改革是那些范围和速度受到限制的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变革，改革成为中国农村变化和发展的转折点，改革是另一类的国家权力运作。具体而言，体制改革是能人生成的助动力。转型期中国农村政治结构的变迁的过程，是现代化背景下由国家主导的乡村社会制度的变迁过程。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家推行的一系列农村改革和这种村庄政治、权力结构与秩序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分田到户被认为是这些改革中影响最深远的。在中国农村的变迁过程中，国家所发挥的重要角色和改革的作用，可以概括为规划性的农村制度变迁：近代以来一直努力这样做，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新型的农村政治结构；人民公社时期所形成的“村社合一”的政治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以“自治”的名义来规划与掌控农村社会。

在市场化的冲击下，村庄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

^① 毛丹：《村庄的大转型》，《浙江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0 期。

也向政治结构渗透。村庄权力结构的蜕变当然不仅仅是改革的直接结果，它也是体制转型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势。乡村社区的结构转变，是指传统乡村社区的自然经济及其相伴随的社会权力结构向市场经济以及相适应的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变。有论者已经指出，“90 年代权力关系的发展，既是新旧体制更替所带来的，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长所带来的，它的取向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权力关系”^①。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村庄的职业与阶层结构，从而导致乡村权力主体发生明显变化，即占据乡村权力中心地位的老式干部让位于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经济精英或能人，或者原先的村干部借助于市场经济而致富，加入经济精英阶层，一起直接介入公共权力，成为与村庄权力体系密切相关的村庄政治家，因而，乡村的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总之，改革与市场这两个外生变量造成农村社区的转型与变迁。改革属于国家行政权力的嵌入，而市场属于社会力量的渗透，但是无论是改革还是市场所带来的中国村庄权力的生成与变化，都属于外在因素。这些外在因素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村庄政治与权力结构演变的最为根本的力量，无论南方的村落还是北国的农村，无论是沿海的农村还是中西部的农村，概莫能外。但是，之所以造成了中国农村政治与权力结构变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又与村庄自身的历史、村落背景、所在的区位及机遇等方面相关联，这就是说，宏观的制度与环境相同，但微观的条件、境况和机遇不尽相同而造成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领域的变化与格局的多样性。由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治尤其是权力结构演化的逻辑与动力就变得清晰起来：外力的“改革”和“市场”这两个外生变量“渗透”到基层社会，与农村社区自身的逻辑发生碰撞和融合，与村庄的情境两者交融，共同作用于农村社区，形成了不算激荡却绝对深刻的 30 年村庄政治演化史。

因此，一个基本思想就是，1949 年以来国家在推动村庄权力的转型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村庄领导的变化是国家与农民关系变

^① 林尚立：《权力与体制：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逻辑》，《学术月刊》2001 年第 5 期。

化的最好标志。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因素不仅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影响之深，而且也全面地影响并改革着社会多个领域，其中包括乡村社会。因此，在我们分析村庄政治的框架中有两个重要的变量：制度创新与财富。财富与权力和威望的关系之变化，重塑财富在村庄权力、权威中的作用；这是市场的逻辑在村庄中的显现，而外在制度的嵌入，则是改革所加入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节 分析框架与研究思路

村庄治理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问题。在有关权力的文献中，引用最为广泛的概念是由罗伯特·达尔提出的。达尔认为，权力并不是个人所拥有的什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据此他提出了权力的定义：“甲对乙拥有权力是指甲能使乙做乙本来不一定去做的事。”^①由此可见，权力实质上就是一种关系，权力的实质常常被看做一个行动者对另一个行动者的强制性的控制。权力结构是指权力的组织体系，权力的配置与各种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所谓村庄权力结构，指的是村庄决策权力在各个阶层的分配状态，具体表现为决策人士的阶层及其组织形式。社会转型期，村庄权力结构的多极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党政组织为主体的组织多样化和村庄权力阶层的多元化。

就中国农村而言，渐进的市场化和改革所带来的制度变迁导致村庄权力和秩序发生了种种变化，那么村庄遵循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权力模式？外生的变量与农村社区自身的逻辑之间产生了什么样的关系？这对农村社区的秩序又意味着什么？30年农村的改革开放与变迁说明什么？权力结构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又说明什么？变化的实质是什么？怎样的理论与分析框架可以用来理解农村的权力结构之变化？

有关社区（community）权力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西方社区研究

^① Robert A. Dahl, "Decision-Making in a Democracy: The Supreme Courts a National Policy-Maker", *Journal of Public Law*, 1957 (6), pp. 279—295.

的重要内容，其中有关社区权力主体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主流观点：精英论和多元论。精英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亨特、米尔斯、戴伊和多姆霍夫等。他们认为，研究社区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出“领导”——社区权力的代理人^①。这个理论采用“威望法”和“职位法”，前者假定有权力声望的人就是掌握实权的人；后者假定那些在社区主要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中占据关键职位的人就是社区的领导者。精英论的核心观点认为社区权力掌握在一小群人手中。多元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波尔斯比和沃尔芬加。他们强烈批评精英论，强调实际决策过程是通过实际行为而不是声望来完成，职位所代表的“潜在的权力”不同于决策中的“实际的权力”，精英论只能测量权力资源的静态分布，却无法发现权力的动态运作^②。因此，多元论主张社区权力研究的核心是社区的重大决策事件，在决策过程中寻找社区当权者，进而勾勒出社区内的权力分布^③。

那么，如何分析中国农村的变迁尤其是政治权力的演变与具体的运作情况呢？对此学术界已经做了不少的努力，形成了一些有一定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框架、开放的村庄共同体的解释框架。费孝通的“双轨政治”、孔飞力的“士绅操纵说”、杜赞奇的“经纪体制说”、孙立平的“皇权—士绅—小农三层结构说”、徐勇的“双重角色说”、戴慕珍（Jean C. Oi）和徐维恩（Vivienne Shue）的“庇护关系说”、恩格（Jonathan Unger）和黄宗智的“国家代理人角色说”等，这些都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分析的。总体上说，背后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是规划性政治变迁中的村庄政治，因此村庄政治是一种“代理政治”。另一些学者致力于对村庄内部各个权力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例如，贺雪峰的村

① Floyd Hunter, *Community power and Structure: A Study of Decision Maker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3.

② 夏建中：《现代西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燕山大学学报》2000 年第 2 期。

③ 同上。

级权力结构的“模化”说^①、全志辉的“精英均衡”说^②、梅志罡的“均衡性村治模式”说^③。这些分析框架为进一步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的村级组织权力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

本研究就属于权力主体论的范畴，研究的重点就是村庄权力主体结构及其运作，这个界定某种意义上将本研究划入到结构功能分析的范畴之中，重点关注的自然是村庄的各类精英，这属于西方的“精英论”之研究取向。精英结构是村庄权力结构的重要侧面，因为在村庄权力的内部和外部结构中，村庄精英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构成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集合部。因此，对村庄精英的分析可作为村庄权力结构分析的切入点。实际上，近百年来中国大陆乡村精英的地位、作用一直是海内外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关注的焦点。实际上，在中国的村庄，其权力属于多元一体：多元指的是权力主体的多样性，这是变的一面，而一体指的是党支部为村庄权力的核心，这是不变的一面。无论变与不变，权力掌握者的来源发生了变化，并且形成了权力精英主导下的村庄权力结构。

村庄政治的核心是权力问题，村庄的权力格局是分析村落政治的焦点，因此研究村庄政治就必须对村庄权力的产生方式、构成、合法性及运作模式等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逻辑与思路按下列方式展开：首先从村落背景包括人口与阶层出发，因为村落背景是村庄权力的基础。其次，对当下村庄权力的主体从政治（领导）权、自治权和社会权三权进行分析，分别重点描述分析作为村庄权力核心的村党支部的政治权、行使自治权的村委会和以社会权面貌出现的村落公共空间和社区组织，从而勾画出村庄内部的三重权力结构。直接行使“村治”这三种权力的是村庄精英，他们在村庄权力结构中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构成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因此，村庄权力结构

① 贺雪峰：《关于村庄权力的扩展性讨论》，《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② 全志辉：《沉默村庄中的“精英系”与选举操纵》，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学术讨论会”论文，2000年。

③ 梅志罡：《传统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均势性村治——一个个案的调查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2期。

分析的重点又是村庄精英。最后，再通过一个具体事例——旧村改造，看权力的运作，旧村改造集中体现了村庄各权力主体如何运用村庄内外各种资源并互动着。

第三节 个案的选择与研究方法、资料来源

一 七一村：典型的村庄、典型的书记和典型的事例

费孝通先生在调查村庄经济时曾经指出，选择调查单位应考虑两个标准，一个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调查单位应该是“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的范围；另一个是出于研究的考虑，调查单位的大小“应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①。就此而言，本研究所选择的调查村落颇符合这两个标准。一方面，本研究的一名重要研究者长期生活在村庄所在地，有条件深入观察和探究村落的历史变迁、人文习俗以及社会结构演变。另一方面，个案村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接受市场经济洗礼的区域，村落政治、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与市场经济发展本身呈现良好的正相呼应关系，因此完全能够满足本研究主题对个案选择的要求。

典型的村庄：从一个不显眼的、相对落后的村庄成为经济发达、明星型的村庄；典型的书记：村党支部书记，全国性的乡村政治明星；典型的事例：旧村改造清楚地显现出村庄权力的具体运作。位于浙江省义乌市的七一村是一个能够代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变化发展状况的农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浙江省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浙江省文明村”、“金华市魅力村庄”和村党支部书记本人的“浙江省为民好书记”、“义乌市富民书记”、金华市首届“魅力村官”、浙江省新农村建设优秀带头人“金牛奖”得主，从一个经济诸方面落后的村庄一跃成为先进荣誉一大堆的明星村庄，成为一个转型样板。从这样的—一个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村庄政治变迁的境况出发，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戴可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 页。

分析其权力结构及其运作状况,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政治演变的历史进程、特点及乡村政治未来走向等问题,都有相当的意义。

七一村是本研究的个案村,是村社共同体权力之运作逻辑得以展开的一个实体空间。所以,在此对七一村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性的介绍。

现今七一村由3个自然村组成,共有农户420户,1128人,外来人口2500人,村民党员59人,村民代表30人,耕地面积618亩。进入七一村是一条纵贯全村的五号路(原称毛桥路),与横穿全村的东河工商街十字交叉。工商街约有20米宽,道路两旁是商铺,东接东红村,西衔五一村。五号路南段路东区,是一片整齐划一的三层别墅,路西区正在拆迁改造。新建的是由时任市委书记楼国华题名的“七一广场”,宛如娇小美丽的少女,吸引着人们的欣赏与青睐。新修的8栋三层的村级行政办公楼,方直高耸,这里每天都有村干部值班,也是村民们学习的地方。七一广场是村民休闲娱乐的圣地,人造小西湖上有九曲齐心桥,桥上有齐心亭,见证着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大成果,使早已致富的七一村村民享有更好的休闲,增强凝聚力,迅速迈向现代化。这就是七一村现在的景象。

二 主要研究方法

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选择一个恰当的研究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人们的研究中,“是什么”——研究的实质结论——很大程度取决于“怎么样”——获取与分析数据的方法^①。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个案研究(case study)、访谈(interview)和问卷调查(questionnaire survey)被广泛地运用。当然,任何方法都有其长处和弱点。因此,研究者应当选择对其所研究问题最合适的方法。

本书作者采用个案研究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此研究方法使作者

^① William A. Welsh, *Leaders and Elit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9, p. 57.

能够做深入的研究，以此可以获得对所发生之事件及对村民选举和自治做出贡献之人的个人“感受”。个案研究可以引出假说，测试现有的相关理论，以及把目光转向一般类型和趋势，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个案研究并不能或至少不能简单地产生概括性的理论。

问卷调查是数据收集的重要方法。“对政治精英进行调查研究，长处就是其直接性，同时也有可能与他们进行有趣的争论以及让他们再次阐明不够明确的回答。此外，调查研究具有明显的优点，就是可以围绕研究者感兴趣的那些话题而进行。这就是比间接资料如文献目录或纸质媒介更有优势之处。”^①当然，对政治精英进行调查研究也有一些潜在的困难之处。一个是调查结果的有效性，另一个则是方法本身的可靠性。因此，有位学者建议在采用问卷调查时应当更多关注“以其他方法来获取对政治精英和领导的理解，例如（1）访问能够接近精英或生活受精英很大影响的人（可以抽样出样本，通过访问得出一般人对精英的态度）；（2）仔细检查与精英和领导有关的档案及其他文件资料”^②。

本书主要采用个案考察和文献研究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七一村村民和村干部的大量访谈和相关调研，对七一村七一广场、学习室、小店、祠堂等公共空间的实地考察和感受，对七一村各种制度和相关执行效果的考察，对七一村 20 多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纵向考察，来揭示七一村村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的逻辑。

三 资料与数据

本研究的资料，第一，主要来源于研究者深入个案村通过实地调查、观察、访谈等方式获取的第一手资料；第二，通过查阅七一村的档案及相关资料获取相关研究资料；第三，收集相关政府文件、法规以及相关新闻报道作为本研究的参考资料；第四，收集与主题相关的

^① William A. Welsh, *Leaders and Elit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9, p. 56.

^② *Ibid.*, p. 57.